

国际秩序格局变动与宗教安全研究范式的理论衍化^{*}

章 远

摘 要：国际秩序的变动与宗教安全研究的重心有联动关系。抽象意义上与物质实体意义上宗教的各构成要素既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的准因变量，也是国际政治中对外安全政策选择偏好和趋势走向的解释变量。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伊朗 1979 年革命、冷战结束、9·11 事件、乌克兰危机长期化等影响国际秩序格局调整的重要节点，宗教与安全多产生交叠。宗教安全研究的范式从宗教因素不被重视到被安全化，及至被身份认同政治裹挟，继而反复陷入是否是威胁和不安全观来源的争论，其理论衍化体现出古典现实主义安全理论、新安全论、复合安全论的理论整合。当前学界的宗教安全研究是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面向人类争取更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走向更具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过程，其研究视角和研究议程更加宽广。

关键词：国际秩序 宗教安全 理论整合 非传统安全

作 者：章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世界政治正在经历快速变化。自乌克兰危机和加沙危机越来越长期化和复杂化，美西方和全球南方在对世界秩序的看法间差异正在扩大，其背后是在诠释架构中，国际各方力量对国际秩序的解释权的权力平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场局部冲突长期难解的很大原因，在于旧有国际秩序中主导力量枉顾国际公平正义，而用“自身例外主义”偏袒盟友，事实上执行双重标准，从而导致国际社会提出的冲突解决方案遭遇反复受阻。受两场地区冲突长期化的打击，国际社会对地区安全组织无法阻止与宗教相关的杀戮的担忧愈见突出。冷战之后，国际秩序基本遵循的是美国治下核大国间平衡的秩序模式。回顾巴以和平进程，巴勒斯坦悲剧既是美国中东战略核心成员对阿拉伯世界文化和历史的无知和傲慢^①，也是相关国家政府盲目追随美国秩序的恶果。避免战争、建立和平环境所需要的相互信任很难在滥用军事占领、封锁、制裁的旧秩序下形成。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对于绝对权力强势国家维护国际公义抱有充分的信心，出于应对不安全感而自保，领导阶层普遍只追求任期内经济、政治收益而躲避安全责任的短视政策。封闭的现实主义政治逻辑、保守的重商主义经贸思想在世界各地重新回归。

尽管国际氛围日趋保守，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仍然力求在保护宗教安全、避免宗教文化隔阂等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东和平的治理困境变化和中国的对策研究”（24BGJ078）的阶段性成果。

① Chris Hedge, “The Four Horsemen of Gaza’s Apocalypse”, *Substack, The Chris Hedges Report*, Jan. 21, 2024, https://chrishedges.substack.com/p/the-four-horsemen-of-gazas-apocalypse?utm_source=substack&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share.

层面有所作为。比如面对日渐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现象，2024年的“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决议促请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针对穆斯林的仇恨和暴力侵害，鼓励且尊重宗教多样性。^① 宗教应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之一。以宗教归属为动机的人身袭击行为是各国法律和道德都不可接受的暴力行为。在研究和了解的基础上尊重神圣文本、敬拜场所、信仰标示，^② 这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主流国际组织推广的关键原则。

遗憾的是，国际组织推崇的包容理想往往遇到现实落地难题，在宗教分歧严重的区域尤其突出。2024年1月22日，阿约提亚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废墟上新建起的新罗摩庙（Ram Mandir）揭幕，据此，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称此日为印度“新时代的黎明”。^③ 20世纪，在宗教圣地阿约提亚，印度信众为罗摩神庙和巴布里清真寺在同一地址上的寺院合法权和正当性争论不休，直至爆发印度独立以来最严重的宗教冲突。阿约提亚神庙和清真寺的争端是印度民族国家中印度教信众和穆斯林群体认同的“象征焦点”^④。讽刺的是，本世纪初，即便是对跨宗教文化对话保有信心且以此批驳文明冲突论的西方学者也预测到，印度难以坚持前殖民政权留下的遗产——世俗国家框架内宗教共处。^⑤ 新罗摩神庙落成并不能证明信仰群体的宗教不满已经得到妥善解决，也不意味着宗教歧视的消失，相反，只能佐证莫迪政府在借用宗教领域的多数主义支撑其治下的印度教至上主义，是对印度建国时世俗主义理想和现代国家普遍遵守的宗教宽容原则的多重背叛。

应该承认，宗教安全研究重心的转移极大地受到国际秩序格局变动的影 响。本文致力于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为何宗教安全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可以被研究，为何宗教与安全会产生交叠，宗教如何被安全化以及宗教是否可以避免被安全化，通过回答上述问题得以客观归纳宗教安全的边界和变动轨迹。

一、宗教安全可以被研究

“身份地缘政治”^⑥ 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可以反过来解释宗教安全问题为何能够被显著地注意到和被政治势力利用。相较于伤亡更严重的尼日利亚绑架、苏丹饥荒、埃塞尔比亚内乱，乌克兰危机和加沙危机等更能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对于这一现象，“身份地缘政治”的解释是，国际事件的观众存在基于身份认同的注意力偏差和选择性共情，再加上国际新闻报道对阅读量和报道成本的权衡，两个向度的影响因素交织，导致种族、性别、宗教等与身份有关的认知会左右某些国际冲突相较其他更加受到世界的关注。该理论的解释逻辑是，承认社会交往中强调宗教亲缘的划分既是为了区分个体差异，也起到提供集体身份依赖的作用。原子化的个人借助宗教完成自我认知，也从无拘无束的个人，到接受宗教社群带来的依附关系。宗教安全之所以可以被研究，与宗教的构成、安全的构成、宗教安全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均具有典型时代政治回响有关。

① “UN Calls for United Action to Combat Rising Islamophobia”, *UN News*, Mar. 15, 2024,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03/1147626>.

② “UN Rights Chief Urges Comprehensive Action Against Religious Hatred and Discrimination”, *UN News*, Mar. 8, 2024,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03/1147437>.

③ “‘Ayodhya in Euphoria on EVE of New Dawn’: Indian Newspapers Dedicate 24/7 Coverage to Ram Temple”, *CNN*, Jan. 22, 2024. https://edition.cnn.com/asia/live-news/india-ram-mandir-ayodhya-inauguration-24-01-22-intl-hnk/h_a2af754b906bb9354c70f63e1b9455d4.

④ [荷兰] 范比德 《宗教民族主义：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印度》，张伟东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第9-10页。

⑤ [德] 迪特·森格哈斯 《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187页。

⑥ Gideon Rachman, “Ukraine, Gaza and the Rise of Identity Geopolitics”, *Financial Times*, Mar. 25,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c9173148-22d9-444b-8a8c-b14585a7db26>.

（一）宗教作为安全构成要素

宗教学对宗教安全是影响社会安全的一个主要要素持肯定态度。^① 传统政治学讨论国际安全，多围绕理性、利益和权力，去试图解释战争的成因，提出干预和结束战争的方法，谋划维持和平的大战略和战术等。^② 传统的安全研究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即以维护主权完整性为核心，把国家之外力量对主权的干预和消解视为威胁。^③ 伴随两极格局的结束，地区性大国在国际秩序中有更为活跃的表现。观察者更明显地体会到以色列、伊朗、沙特、印度等地区大国的外交政策明显地受到国内宗教群体意愿集合和宗教思潮变动的影 响。由此，宗教研究者愈加明确地指出上述现象背后是传统实体化、物质式的国家安全与宗教规范及宗教价值结合的结果。^④ 晚近些的新安全论对传统安全研究作出修正和补充：不仅针对古典安全研究衍化后遇到的研究范畴狭隘争议提倡拓展分析对象的层次和议题领域，还提倡关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⑤ 的过程。

（二）安全成为宗教的必要生存目标

国内宗教研究学者总结宗教与国际关系透出三个显要问题值得研讨，分别是：宗教与战争的关联性；宗教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相关度；宗教间对话。^⑥ 欧洲学者不惮于直言宗教和国际安全关联度的提高，相当于是西方世界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体系建立以来国际政治领域刻意忽视宗教因素的“忏悔化”^⑦（confessionalization）。该反思与 2001 年“9·11”和 2014 年“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建国”之后，各国安全政策向抑制和预防宗教引发的不确定方向剧烈调整，都相契合。出于对边界安全的考虑，冷战结束后，反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观察者担忧包含宗教因素在内的社会要素资源匮乏会引发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始终提醒领导层对周边国家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保持警惕。

社会层面，由于在执行经济复苏政策上乏力，导致欧洲民众不仅担忧所处地区的经济治理能力，还推而广之担忧欧盟和本国政府在应对“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移民潮带来的宗教社会多元化局面也治理乏力。宗教自由和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的紧张关系已经是欧盟多元宗教治理中存在的根本权利间一般冲突。^⑧

（三）宗教安全有强时代属性

学界普遍认为，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宗教文明世界的概念出现在冷战结束之后。塞缪尔·亨廷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系统地提出文明，特别是文化和宗教，将会是区分现代人的决定性特征。基于对文明冲突论的历史性审视，冷静的学者认为，强调一国文明的优越性、强调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单一文明主导下的和平，都是制造冲突的人为行为，而不是文明的自然本身。^⑨

① Pauletta Otis, Philip Jenkins, Chris Seiple and Joshua White, “Religion and (In) Security: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llenge” in Robert A. Sieple and Dennis R. Hoover, eds., *Religion and Security: The New Nex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② 阎学通、徐进编《国际安全理论经典导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 页。

③ Taylor Owen, “Human Security—Conflict, Critique and Consensus: Colloquium Remarks and a Proposal for a Threshold-Based Defini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35, Issue 3, 2004, pp. 373-387.

④ Jeffrey Hayne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Jeffrey Haynes, ed., *Handbook on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1, pp. 5-6.

⑤ [英] 巴瑞·布赞、奥利·韦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1 页。

⑥ 金泽《宗教学理论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391-407 页。

⑦ Delphine Allè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rom Confessionalization to Securitization”, in Jeffrey Haynes, ed., *Handbook on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1, pp. 100-101.

⑧ 张崇富《宗教治理：欧盟治理的难题》，载《欧洲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71、78 页。

⑨ Josephine Quinn, “What the World Gets Wrong about ‘Civilisation’”, *Financial Times*, Feb. 2,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bb445b57-22e1-4e97-8d3f-f875d21f7877>.

21 世纪初，国际关系和地区政治研究的著作对国际秩序变动的观察是以“文明的冲突”^①与“文明的共存”^②相对照，是以宗教信仰切入更广义的文明间交流、竞争和碰撞研究。《在华盛顿代表上帝》的作者认为，基督教的全球化将美国教会与他们国外的宗派同道联结在一起，并通过府院游说促进美国推出人道主义目标为名的外交政策。随着通讯手段的急速提高，美国教会的政治游说越来越有国际性。^③

依照冷战结束前后西方学者对国内政治秩序与宗教合法化功能的判断，当世俗主义的政府无法提供民众、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安全、发展和正义等需求时，宗教和宗教组织是提供合法性的替代选项。^④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并不具备完整和成体系的基督教以外宗教常识，也不具备主动了解的积极性。^⑤西欧基督教文化背景社会的其他宗教知识盲区和缺乏宗教同理心，为宗教右翼和民粹主义提供了利用的空间。欧美日渐抬头的右翼民粹主义，把新世纪以来的新移民和他们背后的宗教渲染为生存威胁，污名其为激进的恐怖主义，制造社会不安全感^⑥，从而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赢得选举继而推行国内仇恨移民、排斥移民的相关政策。以上这些行径在“安全”理由的掩盖下反复出现。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的第 13780 号总统行政命令，也即“禁穆令”是典型例证之一。事实上，煽动宗教仇恨言论不仅侵蚀西方自傲的言论环境，更造成社会的不安全。更糟糕的是，美欧政治文化的仿效国家和追随国家，比如以色列和印度等国也出现类似的构陷领土之上的穆斯林为安全和文化威胁的趋势。这对稳定、平和的世界稳定愿景而言，不是好消息。

二、国际秩序格局变化下的宗教与安全交叠

传统安全研究遵循现实主义分析径路。初期国际安全研究专注为人类历史上难以消弭的战争现象提供解释模式和预防方案的研究。安全问题的理论研究涉及行为体的具体行为，也涉及行为体之间形成的结构，还包括行为体之间互动生成的变动关系和过程。宗教是体验、是艺术，宗教现象是符合社会情境和历史发展的，观察宗教的角度则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

宗教安全研究的学科定位变化与安全研究本身的时代性有对应关系。一般认为，20 世纪 40 年代，对战争的反思催生了安全研究。^⑦安全研究自兴起之时起就与主权、政权等于国家密切相关的高政治概念绑定有关。^⑧安全的主要内涵是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关注国家否受到外部军事威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基于欧洲大国协调逻辑，即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设计的“世

① Josephine Quinn, “What the World Gets Wrong about ‘Civilisation’”, *Financial Times*, Feb. 2,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bb445b57-22e1-4e97-8d3f-f875d21f7877>.

② [德] 哈拉尔德·米勒著 《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郗红、那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美] 艾伦·D. 赫茨克 《中文版序言》，载 [美] 艾伦·D. 赫茨克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徐以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13 页。

④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115.

⑤ Jeffrey Haynes, “Right-Wing Populism and Relig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Jeffrey Haynes,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 170-171.

⑥ Louis A. Cainkar, *Homeland Insecurity: The Arab American and Muslim American Experience After 9/11*,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9, pp. 4-7.

⑦ Alan Collins, “Introduction: What is Security Studies?” in Alan Collins,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1-2.

⑧ 朱宁 《译者序——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载 [英]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 页。

界秩序”^①模式的迷恋已经不再被全球广泛认可。在更加复合多元的世界，世界秩序是分领域、分制度平台的。^②当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化的同时，双边的、地区的、全球的多边机制也在走向更加碎片化，战争和冲突催化了地缘政治的分裂。大国竞争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分裂的国际政治现实使得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不得不选择是站队跟随、平衡摇摆还是战略中立外交策略。

（一）宗教安全研究的理论流变

世界大战是安全研究的黄金时代，而世俗的研究传统无视宗教安全存在的价值和影响力。随着安全研究领域的扩展，宗教先被纳入非传统安全范畴，后又因西方国家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惧而把宗教写入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造成宗教安全受到与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并行的关注力。在美国于中东等地区战略撤退、盟友国家对美国的信心下降、国际秩序多极化的当代，宗教安全研究更外显地反思主导国国家利益至上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

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全研究关注的重心是核威慑下的核安全，用现代意义上的均势平衡实现压力下的国家安全。这一时期，宗教的安全事实上被融入国家安全之中，尚未获得研究界对其独特性的足够重视。要说明的是，即便到了全球化退潮、民粹主义回潮的后疫情时代，将宗教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框架下讨论仍然是政治学的主流思考逻辑。

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安全议题被推广到军事之外的领域。特别是与神权高度绑定的共和制中等强国的出现，冲击到世俗政体主导的世界政治秩序。宗教安全自此构成对此前强调军备竞赛的安全关切的反思。

冷战后，安全领域的研究得到变革式发展机遇。变化的核心表现是围绕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对国家中心主义安全观^③提出有力挑战。随着全球反恐战争和气候安全等时代命题的出现，安全研究的子集不断。正由于子集过多，美西方安全研究理论学派之间愈加重视明晰壁垒。^④中国的安全研究反而因此得以兼顾欧洲安全研究的批判主义和美国安全研究的现实主义的优势。

哥本哈根学派的国际安全研究者虽然赞同冷战后美国仍是超级大国，但鉴于全球层次并没有极端支配性力量的大国，因此世界秩序更接近由超级大国、有全球极大影响力的体系层次的大国和地区层次大国链接起全球和地区的复合体系结构。^⑤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基于地区主义立场，对结构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修正。

（二）从西方中心主义到转向东方的宗教安全研究

美西方学界对宗教与安全的学理性探讨包含“宗教与安全”“安全的宗教”“宗教的安全”“国际宗教安全”“宗教国家的安全”“国家安全框架内的宗教安全”等从宏观到具体而微的多层次研究领域，因为涉及宗教因素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以及国际安全框架而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动荡且宗教文化多元的地区，宗教因素在塑造当地政治文化、促成特定政策制定、凝聚民心以动员社会力量等方面扮演不容忽视的角色。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单极实力迅速增长，美国安全观念的安全边界扩大，即不再满足于相对安全转而追求绝对安全。中国的崛起逐渐被美国视为是国际安全领域的最重大事态。美国智库研究者认为，当国际交往以本国利益为准绳，构建稳定的亚洲地区安全框架以维护在该地区的巨额

① [美]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XII-XV页。

② [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4页。

③ Edward A. Kolodziej,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6-27.

④ [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203页。

⑤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页。

贸易，以及应对全球性威胁将是中美利益共通之处。^①

“9·11”事件之前，警惕的美国学者就觉察到，尽管美国是“绝对的世界领袖”，但非传统的不对等手段，比如利用救世主和殉难者思想的灾难性恐怖主义活动是唯一抗衡美国势力的办法。^② 源于对欧安会、北约等旧安全机制的迷恋，美国实际上在亚太地区推行的安全战略是预防性防御战略。后“9·11”时代，宗教间关系紧张、宗派主义等有转化为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威胁是全球安全关注的中心。美西方宗教安全研究宗教极端主义的目标是可以按图索骥地预防西方安全受到威胁，而不是为不同国家均提供预防方案和保证防御能力。

宗教作为独特的社会元素，从定义源头，表现的就是与信仰的实践反应，首先影响的是人的心灵建构。^③ 从伤痛的心理记忆转化为宗教仪式出发，宗教是固化痛苦的媒介，正如犹太人的集体受难记忆的回忆固化过程。^④ 直面可能造成苦难的威胁，并作出有政治实践意义的应对策略，是安全理论的出发点。同理，避免恐慌，消除受威胁感，是讨论宗教安全的心理基础。^⑤ 与从人的安全出发的非传统安全式理念不同，自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将宗教纳入国家安全政策之中。从进攻性现实主义思考路径出发的美国外交政策是把宗教议题作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工具。^⑥ 不论外宣时使用“促进宗教自由”“保护宗教权利”等口号，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上是为了巩固美国的国家安全。

20世纪下半叶的另一类流行观念则认为由于宗教活动流行度降低、信众的信仰忠诚度趋弱、宗教组织越来越无力干预国家公共事务，据此宗教在公共生活的神圣的重要性在下降。即便是以宗教多元化的展现方式，社会碎片化实际上加剧宗教竞争，包括替代性宗教现象。由此，宗教领域的西方研究学者提出：对于人类需要超自然慰藉而言，宗教永恒；然而宗教也必须适应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以生存。^⑦ 同一时期的中东学者则批判西方发展模式无法适配中东的特殊国情，认为只有强调本土主流宗教文化和宗教精神的根本地位才能保证既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遗存，同时不被现代世界淘汰。^⑧ 文化他者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一方面将对国内种族主义的警惕延伸到对东西方宗教等文明身份实体固化的警惕，一方面由于观察到前殖民帝国领导的美西方文化在新兴国家的影响力错位，而感慨于国际秩序的去中心化。^⑨

（三）解释宗教安全的理论进路

宗教安全不仅仅与跨群体传播教义等造成宗教人口变动的行为有关，还会与政治政策导致的特定后果有相关性。比如美国在中东地区追求非美国盟国的政权更迭，事实后果却导致当地出现宗教极端主义。而随时代变化、社会发展宗教安全的内涵也会不断变动。宗教安全不是封闭

① [美] 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 《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安全战略》，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20页。

② [美] 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 《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安全战略》，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③ Daniel L. Pals, *Nine Theories of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69-270.

④ Jan Assmann,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 Ten Studies*,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6-8.

⑤ Marie A. Eisenstein and April K. Clark, "Political Tolerance,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Religion: Disaggregating the Mediating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Politics and Religion*, No. 7, 2014, pp. 287-317.

⑥ Casey Lucius, "Religion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55, No. 1, 2012, pp. 50-70.

⑦ Bryan R. Wilson, *Religion in Secular Society: Fifty Years on*, edited by Steve Bru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8-10; Rodney Stark &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The Future of Relig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14; Steve Bruce, *God is Dead: Secularization in the We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⑧ Chandra Muzaffar, "Understanding Ali Shariati's Political Thought", in Dustin J. Byrd and Seyed Javad Miri, eds., *Ali Shariati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 Theory: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Leiden: Brill, 2017, pp. 170-180.

⑨ Naoki Sakai, *The End of Pax Americana: The Loss of Empire and Hikikomori National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5-14.

概念。

新自由主义理论把宗教的作用解释为一种资本形式。^① 在基于共同利益寻找经济合作空间的新自由主义看来，把宗教理解为资本的思路有助于找到各方都可接受的共同利益继而指导行动，从而维护和平和安全实践。据此思路，新自由主义学者乐于肯定国际组织所搭建的国际机制平台，认为在国际组织内，围绕宗教安全、安排利益协调的讨论可以现象涉宗教议题专门人士能力的扩散和增值。

借用分析信仰对政治冲突影响的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三种理论进路。宗教因素在冲突中地位分别对应自变量、伪关联性变量和干预变量。^② 对宗教安全的分析，最具解释性（但未必客观）的三个理论径路也是原生性径路、工具性径路和建构性径路，分别对应宗教是威胁的直接责任者、宗教是造成威胁的被利用者，以及宗教安全是随所处环境的主体间性不断调整话语体系结构同时改变规则和认知决定的。除了将动荡和不和平归因于宗教是自变量，宽容宗教是在不安全结构中被动卷入的因变量，以及视宗教因素类同于控制变量，与其他社会要素互相相构安全认知，上述三种理论解释范式之外，宗教安全还有借用付出和收益对比的古典主义经济解释模式，有将信息不对称引入宗教交往观察的制度主义式讨论，以及试图探讨人类与环境问题的批判主义式阐释等理论径路。

国内宗教与国际关系学者早已注意到之所以宗教与安全有深远的交汇。^③ 立论的基础是：信仰比一般社会思想和价值观更为持久、更缺少弹性；宗教组织具有广泛的跨国性和动员力；宗教能赋予得不到世俗合法性的组织和行为以某种宗教信仰群体内认可的独特合法性。

三、被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宗教问题

国内致力于系统搭建宗教与国际安全研究结构性框架的学者曾尝试从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入手，分别细化探讨宗教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宗教性安全威胁以及宗教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和功能。^④ 新的世界多级秩序应避免陷入谁来填补“权力真空”争论的陈旧思路。^⑤ 权力真空是霸权主义世界观的延续，是对一种无人挑战的领导地位的盲信和盲从。追求独大，同时对力量相近的国家保持警惕心的思路，会促使强国过于重视产生胁迫力的国家能力建设，而忽视能够增加人民福祉的能力提升。

把宗教安全解释为一种状态，且视宗教安全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的理论认为，^⑥ 宗教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内部的信仰主体和宗教格局有利于维持国家的安定团结，宗教领域的外部势力和利用宗教工具的外部势力对该国主权、政治制度、社会现状等核心利益不构成严重威胁的境况。宗教问题的被安全化和去安全化都既是现实也是需要被公正评判的研究立场。

（一）宗教的被安全化

安全化研究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本质为言语行为。因此当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一般指代表主权国家的合法执政府，宣布某一议题为国家安全问题时，该议题就成为某个威胁，而安全化

① Elizabeth Shakman Hurd, *Beyond Religious Freedom: 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Relig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xii.

② [德] 哈森克勒夫、[德] 福尔克·里特伯格 《宗教的作用何在？——信仰对政治冲突之影响的理论分析》，载 [意] F·佩蒂多、[英] P. 哈兹波罗编 《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张新樟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2 页。

③ 徐以骅 《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载徐以骅等著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 页。

④ 刘骞 《后冷战时代的宗教文明与国际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49 页。

⑤ Zhang Yua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The Formation of Counterhegemonic Multipolar Order", *Tehran Times*, Mar. 17, 2024, pp. 1-2.

⑥ 徐以骅、章远 《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载《复旦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第 110 页。

过程具有超越了日常政治议程位序的特定政治后果。

早期与宗教有一定联系的国际关系理论有正义战争论、基督教伦理学，多是自然主义、伦理道德观与现实政治解释的杂糅，属于认识论范畴。二战以后，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变动时期，宗教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考察因素或者说国际社会交往的元素存在，而宗教真正成为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要素则与身份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重要性提升同步。宗教被理解为在民族自决、摆脱殖民遗存、争取民族自决的大事件中确定特殊性的依据之一，从属于文化和文明集合。宗教从文化、文明的子集地位独立，成为国际关系中需要专门考量的对象，则始于从苏东剧变到“9·11”事件之间。^① 原本世俗性很强的国际关系理论届因由出现宗教威胁论、宗教例外论等等理论争论而陷入宗教与冲突之间的关系的反思，而特定暴力互动、恐怖主义行径会被解释为受宗教动员，甚至干脆就归罪于宗教背景的组织。

冷静的研究者们会告诫具体分析中应避免使用粗浅的两分法，比如陷入是世俗还是宗教，是西方还是非西方等二元对立论，否则仅凭不同宗教人口增长比例就草率得出“宗教关系会走向紧张”^② 这样简单化的错误结论。同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都有明确的共识：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讨论中，教义应被排除在外。^③ 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包括在世界秩序变动框架下对含宗教因素的安全领域研究，非常强调抽象层面的可比性，换言之，构成宗教的那些组成部分，比如身份、组织、领袖、器物、场所、权力甚至非实体的情感等等世俗政治也具有方面是可以比较和考量的。分析者由此可以绕过对宗教内涵中超验部分的敬畏，而专注于宗教更加当下和外在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安全化理论作为诞生于英国的国际关系中层理论，其代表学者们自省过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④ 尤其在“阿拉伯之春”和“伊斯兰国”组织制造了连绵至今的地区动荡和严重的危机外溢效应之后。

从政治治理的视角来看，群体交往的过程中，不应由宗教担负起人类安全命运的责任，政府和政府间组织才是合适的责任承担者。在冷战结束前，此类观点挑战者罕见，而冷战时代，宗教间对话的支持者正面地意识到宗教的全球责任。^⑤ 当宗教在国际关系领域复兴之前，宗教研究者对宗教与安全乃至和平问题上的地位和作用，态度是矛盾的：^⑥ 一方面观察者承认抑制宗教行为在政治领域扩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避免因排他性出现的冲突战争，从而有利于群体和平。另一方面，允许宗教发挥维系心理安全感、社会关系平稳等功能，强化宗教在促进良善秩序等高伦理道德标准方面的积极作用，则也有利于群体和平。

（二）宗教的去安全化及非安全化

宗教的非安全化，或者说宗教的去安全化，是将宗教问题从威胁考量名单中剔除。这意味着宗教，包括意识形态意义上、组织意义上以及行动意义上的宗教，都不能是安全化的施动者。宗

① 也有观点强调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时代转折意义，认为其所代表的宗教政治化现象以及此后中东地区的宗教内部教派紧张关系佐证独立的宗教要素的跨国政治意义提升。参见徐以骅《宗教在 1979 年》，载《宗教与美国社会》2016 年第 1 期，第 3 - 15 页；Steve Bruce, *Secularization: In Defence of an Unfashionable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90 - 193; 等等。

②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Tolerance and Tensio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Pew Research Center*, Apr. 15, 2010, P. 8, <https://www.pewforum.org/wp-content/uploads/sites/7/2010/04/sub-saharan-africa-full-report.pdf>.

③ Mona Kanwal Sheikh, Morten Valbjørn & Dino Krause, "What is Exceptional about Religion? Major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lamism Studies and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in Jeffrey Haynes,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 212 - 213.

④ Mona Kanwal Sheikh, "Recursion or Rejection? Securitization Theory Faces Islamist Violence and Foreign Religions", *Global Discourse*, Vol. 8, 2018, pp. 26 - 38.

⑤ [美] 保罗·尼特《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王志成等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3 - 143 页。

⑥ [西] 雷蒙·潘尼卡《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思竹、王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1 - 90 页。

教的非安全化是宗教因素、宗教问题同时被宗教内部和宗教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全部集体认识为除紧急事态外，需不要被过度提防的议题进化过程。从国际关系交往的现实来看，在国际政治场阈上争夺话语权的大环境下，宗教议题转化为政治政策的安全化过程比非安全化过程操作性更强。

一方面，类似雷诺·加缪 (Renaud Camus) 的“大置换” (The Great Replacement) 理论，把前殖民地国家人口向殖民国移民现象称为“反向殖民”，此类理论正在被自诩西方文化是高等的、纯粹的文化右翼阴谋论者利用，仇视异域文化，仇视带来异域文化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① 另一方面，从西方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宗教在鼓励民众走出战后困境，帮助解决分歧和冲突，共同回应社会发展需求等方面都能够产生正面作用。在国家内部涉及宗教的政治问题无法解决，以及内部问题蔓延为地区或者国际问题时，国际关系治理意义上的宗教与安全产生交叠。^②

在政治学研究学者看来，由于宗教或信仰所含的价值观体系弹性不如普通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且宗教具有天然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跨境属性和隐蔽性^③，故而宗教与国家安全之间，特别是有关秩序和主权的领域，可以通过相关问题安全化而产生联系。威胁则可能来自于互为因果的内部、外部以及跨领域互动。在此意义上，宗教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的组成部分。^④ 以本国为出发点，所判定的宗教安全状态是指内部信仰群体和信仰格局有利于安定团结，外部势力无法通过宗教领域对本国的主权、政治制度、社会现状等国家利益构成威胁。^⑤

四、宗教安全的边界和变动轨迹

研究宗教安全的根本目的是化解僵局，消除潜在的威胁，达到和平和共同安全。现实主义政治学和宿命论在对人类无法彻底摆脱不安全方面反而算得上盟友。从修昔底德、克劳塞维茨等古典政治学家研判安全困境问题是，就基于无法解决安全困境的前提来退而求其次寻求缓解安全困境，宗教安全的边界在分解困境与解决困境的策略变动往来中逐渐明晰。

(一) 宗教安全困境

宗教安全困境的典型场景很多，比如经典的主体性困境。宗教安全追求服务于宗教原则的安全抑或是实体化的宗教仪礼、人物、组织的安全。

又比如利益序列困境。围绕是相对安全重要，还是绝对安全重要，是公共性安全为先还是个体性安全为先的疑问，决策者很难给出非此即彼的单一回答。信仰者个体和宗教群体集体的最终目标未必是一致的。

宗教安全与宗教的安全、国家的宗教安全、国际的宗教安全之间的概念纠缠困惑也属于安全困境。宗教的特殊性导致与其他安全不同，在维护宗教安全的力量可能不仅涉及内部参与和外部干预的理论争论以外，还有干预手段是虚妄的还是实体的分野。

国际视野下的宗教安全追求国家内部内部宗教状态稳定和谐，外部不受宗教性质或来自宗教势力的严重威胁。当今时代维度下完整的宗教安全全面估计到宗教意义上的人的安全、组织的安

① Steve Rose, "A Deadly Ideology: How the 'Great Replacement Theory' Went Mainstream", *The Guardian*, Jun. 8,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jun/08/a-deadly-ideology-how-the-great-replacement-theory-went-mainstream>.

② Jeffrey Haynes, "Introductio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 in Jeffrey Haynes,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 1-2.

③ 王伟 《国外宗教多元化与族群冲突研究现状及反思》，载《世界宗教文化》2020 年第 1 期，第 84 页。

④ 徐以骅等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2 页。

⑤ 徐以骅、章远 《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第 110 页。

全、话语安全和发展的安全。解困思路的关键是重视民生，以发展促安全。

（二）宗教安全指涉对象的层级

宗教安全既包含个体的实体安全和信仰安全，也包含宗教群体的群体生存安全，还包含国家免于战争、整体安全覆盖下的宗教安全。与国家中心主义偏重政府政策应对的研究方法有差异的是，宗教安全研究不仅止步于国家层面。宗教跨国组织，或者更准确地说，以宗教信仰为宗旨原则而聚合的跨国政治联盟也是宗教安全研究的重要对象。

宗教安全的内涵要应对四个核心关切：其一，形而上层面，判定宗教造成威胁的政治意义；其二，行为主体层面，宗教安全是可以被动赋予的，还是需要通过主动寻求才能实现；其三，操作过程层面，宗教安全是扩张性还是收缩性的；其四，结果层面，宗教安全的状态是否是脆弱的。

具体而言，判断利益和威胁是化解安全问题的基础。不论是从悲观主义、乐观主义、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还是批判主义出发，借鉴政治学研究逻辑的宗教安全研究都必须首先涉及存在威胁，而应对决策则需要在利益受损的威胁下做出。军事安全领域，夸大威胁往往是对内宣布紧急状态、对外发动军事对抗的必要手段。在宗教领域，依赖集体认同确定存在威胁。在威胁判定之后，继而必须考虑的是宗教安全的主动和被动两个向度。也即要分析宗教安全是保守地随着国家安全演进得来，还是要主动进取或者寻找代理人地竞争得来的。在获得宗教安全的过程中，宗教安全的边界是永无止境，乃至超验的永恒，抑或仅只是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有限追求，是与社会身份匹配且有界限的。最后，达到宗教安全的局面是形成类似核威慑一般的和平状态，还是各安其位的消极和平，并没有统一的共识。

（三）宗教与和平建设

宗教和平建设的研究者认为，宗教作用于安全、和平和发展建设，则宗教与现代性的本体安全不矛盾。与此观点相对，对宗教参与和平建设的批评则源于三种^①担忧：其一，宗教可能帮助建立或者重建某种独一的政治权威；其二，担心东方主义的安全化议程，这其实是从西方优越论出发的忧虑；其三，畏惧打着正义旗号的宗教莽夫。类似的理论解释径路还出现在用宗教安全化解解释宗教对世俗国家攻击的可能性的三种讨论途径中：其一，某一宗教团体被视作对国家生存的威胁；其二，信仰被认为受到了另一种宗教话语或行为的威胁；其三，信仰受到非宗教行为主体或者其他社会发展进程的威胁。^②

文明冲突论影响深远，批评者认为渲染片面的宗教文化对抗的敌对全球观，哪怕理论家的本意是提出预警，也有现实政治中预言自我实现的后果。由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现实原本就纷繁芜杂，只有以宽容讨论前提，而非挖掘和强化人类最深的恐惧、脆弱、忧虑，^③世界的和平共存才可得实现。亨廷顿本人为文明冲突论辩护^④时认为，不论对论点的争议，他的理论创见的时代价值在于为理解变动中的世界政治提供了新的思维框架，跳脱出了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依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结盟对抗的过时模式。事实上，同一时期，欧洲的安全研究也自信为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⑤ 尽管讨论对象是以宗教文化为核心表征的文明关系，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底色

① Atalia Omer and Joram Tarusarira, "Religious Peacebuilding", in Jeffrey Haynes,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 431-435.

② [丹麦] 劳斯特森、[丹麦] 奥利·维夫 《保卫宗教——宗教指涉对象的安全化》，载 [意] F·佩蒂多、[英] P. 哈兹波罗编 《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张新樟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7 页。

③ [德] 哈拉德·米勒 《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郗红、那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 页。

④ [美] 塞缪尔·亨廷顿 《中文版序言》，载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 页。

⑤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是迎合美国不允许其他强国主宰欧洲或者东亚的政治传统。

即便在美西方传媒占据主场优势的舆论宣传战场上，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反感散发着道德优越感的西方世界浸透着西方价值观的报道、评论和消息。其实中国的宗教学人在世界的全球化蜜月期已经注意到当西方媒体出现大量曲解中国报道时，西方宗教界与西方主流舆论站在一边，并不帮中国讲“公道话”，在价值取向和观念上并不与全球化和国际化共情。^① 正如金砖国家扩容是一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舞台上争取国际话语自决权的运动。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是为人类和谐共存、共同进步提供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尊重彼此的关切，在更加公平的国际多级秩序下，互相成就。

结 语

宗教与安全的复杂表现形式中，宗教既可以按照现实主义逻辑与人性这一自变量挂钩而被视为准因变量（an quasi-dependent variable），也可以因为特定国家受宗教世界观影响而选取某种政策而被视为解释变量（an explanatory variable）。^② 不论是国家还是国家内的民众，其生存安全水平的下降与对宗教重视程度上升呈正相关。^③ 在旧国际秩序崩塌之时，由于对所处环境的不安全感和缺乏归属感，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宗教类型、宗教组织、宗教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成员都显著增加。

安全可能是模糊的，国家与民众，信众与无信仰者可以一起塑造公平正义稳定的国际秩序也符合国家利益关切的一个有利于宗教生存发展和安全道德的国际大环境。已有的国际关系研究普遍共识是，宗教，能够被运用到使政策和行动合法化，能够对选民世界观和行为、精英层决策走向施以影响；由此，宗教也可以在取消不良政策合法化，阻止破坏和平和秩序的行动，扭转仇恨的世界观方面有积极作为。一个有序的、体现国际公义的世界秩序既有利于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也有利于所有宗教的安全。

与当前全球南方正在改变世界权力平衡同时，信仰人口也在经历“南升北降”^④ 的重心转移。宗教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宗教地图的传统分布，非西方国家在国际宗教政治舞台上也正在成为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是全球南方大家庭的当然成员。^⑤ 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和宗教学开展的宗教研究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⑥的学术研究。防范和坚决打击宗教极端活动^⑦、遏制宗教极端势力^⑧是对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意志体现。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 卓新平 《“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3 - 225 页。

② Nukhet A. Sandal and Jonathan Fox,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a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36.

③ Pippa Norris & Ronald Inglehart,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6.

④ 徐以骅 《序》，载章远 《全球化时代宗教冲突的地区比较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 - 2 页。

⑤ 徐以骅 《序》，载章远 《全球化时代宗教冲突的地区比较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 - 2 页。

⑥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载《人民日报》2021 年 12 月 5 日，第 1 版。

⑦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19 日，第 2 版。

⑧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载《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17 日，第 2 版。